基于实践的文物建筑水患应对

陈飞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文化遗产安全问题易发高发。中共中央宣传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文物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汛期文化遗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通知》，为汛期文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遵循。作为长江中游洪涝灾害频繁的湖北，根据近年来应对水患实践，在确保汛期文物建筑安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经验。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雨水充沛，且雨热同季，每年进入汛期降雨量增多时，极易造成洪涝灾害。对于本就脆弱的文物建筑，更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惨重损失。2016年和2020年汛期，省内上百处文物保护单位遭受不同程度损害。面对肆虐的洪灾，全省文物部门上下联动，积极应对，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一、湖北文物建筑的水患

（一）水患形成原因

湖北文物建筑的水患形成原因主要是地形、地貌和气候影响。

地形方面。湖北省北部是大别山与桐柏山，西部为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与武陵山，东南部为幕阜山，三面环山形成了向南部敞开的不完整盆地，中间环抱着江汉平原，与南边的洞庭湖平原相连，恰好形成了一个碟形盆地，而来自长江的洪水只能经城陵矶一口流出。

地貌方面。湖北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省内河流纵横、湖泊众多，被誉为“千湖之省”，域内湖泊总面积达到2983平方千米，面积百亩以上的湖泊800余个。域内的长江河道异常弯曲，特别是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县城陵矶之间的长江荆江段，河道蜿蜒曲折，洪水宣泄不畅，极易造成洪水灾害，自古就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藕池口至城陵矶段，更有“九曲回肠”之称，两岸平原地势低洼，加上支流众多，进入汛期降雨量增多时，极易溃堤成灾。

气候方面。湖北属南北气候过渡带，除高山地区外，大部分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降水充沛。特殊的地理位置、密罗遍布的江河湖泊，再加上持续的雨季，让荆楚大地成为我国境内最易爆发洪水灾害的地区之一，主要面临的灾害有水涝、大风冰雹和地质灾害等，其中发生次数最多、造成损失最大的是洪涝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二）湖北历史水患

从西周初期至新中国成立的近3000年间，湖北见诸文献记载的水灾共计600余次，平均每4.5年发生一次。新中国成立至1998年的49年内，发生重大洪涝灾害9次，平均5.4年一次。清同治四年（1865），汉口建立水文站后至1990年以前，武汉关水位超过27米的有12次。这些洪涝及次生灾害对包括文物建筑的生产生活设施造成了严重损坏。清同治九年（1870）发生的洪涝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陵庙尚留有印记，这次洪水属“千年一遇”，长江上游数十个县（州）城被淹没，奉节“水退后城中淤泥高数尺”，中下游有五六十个县（州）遭受水灾，湖北的公安县全境淹没，“江堤俱决，冈峦宛在水中，水浸城垣数尺，衙署庙宇民房倒塌殆尽”。黄陵庙地处湖北宜昌长江南岸黄牛岩下，山门被此次洪水冲毁，后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重建。庙内主体建筑禹王殿金柱上仍保存有这次洪水洪峰淹没痕迹，及历史上关于洪峰的墨书题记。

1931年汉口大水，武汉关最高水位28.28米。据当年的《国闻周报》记载：在汉口市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各种船只在通衢大道上往来行驰，“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1954年，武汉特大洪水，武汉关最高水位29.73米。江汉平原的洪湖地区、东荆河两岸一直到武汉市区周围湖泊一片汪洋，荆江分洪区和其备蓄区全部淹没。湖北全省溃口、分洪水量达到602亿立方米，淹没耕地87.5万公顷，受灾人口达538万。

2016年7月，湖北遭受百年一遇的持续强暴雨天气。强降水引发了山洪、泥石流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洪涝灾害。另外，部分县市还出现了短时大风、冰雹和雷电等强对流灾害。经统计，湖北省总计有26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2个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8个市（县）文物保护单位受损。

2020年5月至7月，梅雨期雨量创同期历史最高，媒体报道称“气候复杂，长江上游（降水）过去都是偏枯的，今年主汛期长江上游降雨也是比较大。再就是来水复杂，洞庭湖、鄱阳湖和三峡下泄流水加上湖北自产的水，这几要素组合起来，变化很多。”湖北监利以下长江段站点全部超警戒水位，四大河湖超保证水位，恩施、宜昌等地山洪内涝。文物受损严重，武汉盘龙城和咸丰大寨坪等古遗址因雨水冲刷造成城垣局部滑坡，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周边山体出现滑坡迹象，给文物本体及遗址博物馆造成严重安全威胁；蕲春李时珍墓、阳新龙港革命旧址和通山王明璠府第、黄梅县博物馆因周边湖水、河水上涨，一度被洪水浸泡；襄阳城墙、蕲州城墙受雨水侵袭局部垮塌；团风回龙山大庙、麻池革命旧址、监利红三军军部旧址等局部垮塌；荆州松鹤堂、松滋苏维埃政府旧址、洪湖路易艾黎旧居、长阳枝柘坪红三军军部旧址渗漏严重；公安红四军、红六军会师旧址、毕昇墓纪念馆因雨水冲刷周边围墙局部垮塌；潜江龙湾遗址、荆州熊家冢考古工地因雨水浸泡坍塌或墓坑局部垮塌。

二、湖北文物建筑应对水患的防灾减灾实践

水患对文物建筑形成的灾情是临时性突发的，不仅要求有工作队伍和预案的前置条件，同时也需要很好的组织协调和制度安排。为此，湖北在水患应对时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文物保护防灾减灾。对文物周边的危岩体和滑坡等险情进行评估，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清理，避免因地质灾害造成损坏；对重要文物和文物密集地周边的河流、湖泊超警戒水位险工险段及时排险；对文物周边排水进行疏通，避免因洪水上涨倒灌或排水不畅，造成文物浸泡形成损坏或垮塌；对存在险情的文物建筑内居民进行转移，避免因文物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二是建立联合防范机制。将汛期文物安全作为防汛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充分发挥文旅（文物）职能部门作用的同时，协调自然资源、水利、住建、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形成联合防范工作机制。三是开辟受损文物维修绿色通道。对汛期受灾的文物保护单位，在维修项目审批上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审批进度，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优先予以保障。其中的工作实践以“万里长江第一阁”观音阁应对长江洪水的成功案例最具代表性。

观音阁又称龙蟠矶寺，位于鄂州市城区以北长江中，始建于元代至正五年（1345）。因位处江心，观音阁不可避免地受到江水冲击，特别是水位高于建筑基础时，容易造成破坏。光绪二十七年（1901），长江爆发特大洪水，观音阁殿宇梁栋与边房被洪水冲走。光绪三十年（1904）重修。1931年，逢长江又爆发特大洪水，观音阁栋折榱崩，损失惨重，后再次维修。1954年，长江爆发百年不遇大洪水，观音阁再次遭受损失，后湖北省文化局拨款重修。1996年7月，洪水冲毁阁之东南墙，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计划委、鄂州市政府共同出资维修。2016年7月，长江水位最高峰时达25.95米，观音阁本体建筑水淹过半，江水淹至第二层窗户中段。2017年7月，观音阁本体建筑水淹过半，江水淹至观音阁第一层窗户上段。但观音阁均没有出现垮塌的险情，一度被网民称为“阁坚强”，是每年汛期的“网红”。很多人因不了解其背后防灾减灾的做法，而简单归结于建筑设计科学和质量水平。

在2015年以前，观音阁存在隐患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矶头隐患。随岩体水上水下，冬夏交替，风化作用不断进行，岩体在风化营力作用下逐步解体，特别是冰劈裂作用，加速岩石解体为碎块状，矶头形成了数条沟壑，岩石存在较多大的裂隙，建筑稳定性降低。二是因多次经历江水浸泡等自然破坏，建筑本身存在梁架歪闪、立柱槽朽、墙体开裂等险情。在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2015年，鄂州市在详细勘察制定方案的基础上，实施了文物保护工程，彻底消除了隐患。同时，针对每年长江涨水季的特点，实施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一是水患季节做好灾害预警工作，落实专人负责跟踪监测水位情况，建立每日水位报告制度，并在观音阁正对面搭建哨棚，进行24小时值守巡查。二是在洪水来临之前，打开建筑所有门窗，使得江水淹没建筑时，可以形成自然流通，减缓对建筑的正面冲击。三是江水超过观音阁基础后，对过往船只提醒，避免超速和超主航道航行，减缓航船通行横浪对建筑的侧面冲击，并及时清理上游浮游物，避免在建筑周边聚集形成冲击体。四是协调联合公安等部门，劝阻游泳人员擅入观音阁。五是洪水过后，及时做好建筑本体修缮和基础加固，并对观音矶的岩体进行检测，适时对岩石砌体充填、局部注浆和坡面挂网喷砼稳固岩体。积极的监测、防范、科学应对使得观音阁虽屡遭水患，但依然屹立如初。

三、文物建筑防灾减灾策略

文物保护离不开科学规划、系统研究和长效工作机制。针对水患的文物建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更要求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地统筹协调。

（一）制定应对灾情的组织协调和处置措施

一是通知到位。每年雨季，在县级层面发布关于加强文物巡查的通知，提醒文物使用单位和个人加强日常巡查与监测，排查隐患，清理文物本体及附近的水道，保持排水畅通，防止因淤塞造成文物被淹，做好汛期文物安全防护。

二是督导到位。在省级层面组建工作专班，制定督导流程与办法，做到在文物出现险情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给予技术指导与支持，并开展维修保护或抢险加固。

三是抢险到位。在第一时间对文物建筑进行保护，最大限度地减少文物建筑历史信息流失；对因水患等灾情造成安全隐患，或者出现坍塌的文物建筑，使用主体或所在地文物部门要及时进行封闭式管理，在文物建筑周围设立围挡和提示牌，并采取临时支护、遮挡受损面等措施，避免险情进一步扩大或出现二次坍塌；对出现垮塌的部位进行清理归安，对周边存在滑坡风险的山体裂缝进行封堵。

四是宣传到位。文物主管部门和当地宣传部门要及时发布消息，回应社会关注，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好文物建筑维修保护

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在给《中国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一书的序言中提到：“文物的保护，主要是防止来自人为和自然两个方面的破坏……而自然的破坏随着各项因素的增长，保护任务更为艰巨，因此文物保护科技成了防止自然破坏最重要的手段。而文物的不可再生性以及由于自然力破坏的不可抗拒性，决定了文物建筑的维修保护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将传统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防止自然力对文物的破坏。”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规定保护原则为：不改变原状、真实性、完整性和最低限度干预。因此在文物建筑修复保护中如何看待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如何看待新材料的应用，都需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理解文物原状的含义，处理好原状和现状之间的关系，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对待新材料和新工艺都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既要维持文物原状还要增强文物的抗风险能力。

（三）要有系统研究和长效工作机制

1.建立灾害预警机制和监测平台。

一是与当地气象、国土、水利等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与联系，完善雨灾预警预报，形成应急联动机制。二是以网络技术为纽带，积极推广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控系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技术，建设覆盖重点灾害区域的主要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和监控平台。三是构建包括灾害应急响应、灾害信息分析、灾害趋势预判等在内的防灾减灾技术及信息资源平台。

2.深化研究，建立科学预防机制。

一是结合文物建筑自身特性，对建筑遭受破坏的形式、破坏的种类、破坏的严重程度进行细密的研究和分析。二是对灾害重点区域风险性因素进行合理评估，研究灾害的内生原因和发生规律。三是建立灾害应急措施，推广先进的防灾减灾技术和管理方法，探索区域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模式。

3.加强日常管理，强化灾害应急反应。

一是强化日常管理部门的防灾减灾意识，建立安全巡查制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二是加强古建筑应急保护培训，提高应急应对保护能力，确保突发事件出现时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妥善处置。

对于文物的防灾救灾，技术手段是出发点，需要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但防灾的过程更需要增强文物保护责任心和使命感，必须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提前谋划，及时应对，积极处置。

“藏品叙事”在“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中的体现

曹植森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下文简称“黄河展”）遵循历史发展脉络，从史前到明清分三部分讲述，以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主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突出黄河、草原为核心的展览特质，彰显中华文明特征，充分体现了鄂尔多斯地区“历史无断代，文物无缺环”，让文物在展览中说话，让观众在文物中感知历史。展览的独特魅力和精彩展示得到了专家肯定与观众好评，荣获第二十一届（2023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对于传统展陈的继承，黄河展拒绝表面上的“形式主义”，而是让传统展示融入现实中，将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瑰宝继续传承和发扬，对展陈内容、展品特点、独特的地域文化、社会公众等诸多方面的需求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梳理，并进行了“藏品叙事”的实践。

展览根据博物馆展厅的空间特点，从对展览的基本定位出发，展示馆藏展品以及相应的地方历史文化，将藏品作为展览设计的核心，采用艺术化等手段，深挖文物背后的故事，提炼精彩信息，凸显地域元素，运用多种辅助手段，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讲故事。

在原有展览藏品的基础上，黄河展根据展览需求再次征集展品，补充、丰富阐释内容，彰显学术力量，全面展示鄂尔多斯的历史面貌与文化价值。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重视所征集的藏品在现在以及未来应具备研究、教育和欣赏的功能。在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展出藏品、进入展厅变为展品，藏品本身经历了解构再建构的过程，在展示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

黄河展展示4000余件（套）文物，珍贵文物多达500余件（套），展出的馆藏文物的95%“新装”亮相，每一件都与展览主题息息相关，无论是“河套人头盖骨”“朱开沟中华第一铜剑”“鄂尔多斯青铜器”“鹰形王冠”“西沟畔金凤冠”等耳熟能详的精品文物，还是“阳湾遗址”“寨子圪旦石城址”“牡丹纹黑釉剔花瓷瓶”以及在10余万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形成并留下的大量文化遗产都汇集于此，使得“黄河从草原上流过”的故事变得更加的细腻、丰富。展览遵循历史发展脉络，以“藏品的视角”讲述了鄂尔多斯各时期文化遗产精华的融汇，呈现了10万年的人类历史和6000年的人类文化“交融”历程。

黄河展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讲述：史前至夏商周时期、秦汉至隋唐时期、宋元至明清时期，整体梳理鄂尔多斯历史脉络，文物链完整清晰，形成环环相扣、衔接紧凑的历史线，使展览本身具有了强大的叙事能力和逻辑线索。这就要求藏品在展示过程中需要和整个展厅具有较好的呼应。

史前至夏商周时期，这一部分是整个展览中面积最大的部分，展览面积为2700余平方米，这一部分文物数量也是最多的，共2400多件（套）。“叙事”环环相扣成了展览的重点，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青铜器时代，都以藏品的时间线为梳理的第一要素，打通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全链条，同时弱化了展柜本身的设计，突出文物讲述故事，在注重展览主题的核心思想之外，还遵循观众的参观心理，以“消失的展柜”打破传统模式中的视觉阻隔，所采用展柜玻璃的透光率超过97%，打造通透的空间效果，将观众的视角第一时间引向文物，优化观众欣赏文物感官体验，形成极致美感的文物陈列空间，形成虚实、古今的共存，达到了功能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秦汉至隋唐时期，这一部分2300平方米的空间内容以蒙恬督修秦直道、昭君出塞、文姬归汉、赫连勃勃大夏国、隋炀帝巡幸鄂尔多斯、粟特人“六胡州”商贸等内容为重点，展出文物1300多件（套）。面对庞大的历史背景，展品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注重历史与故事的闪光点与关键点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黄河展在这部分展示内容上以点串线，以线带面。以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为纲，以历代文物藏品为主，并辅之以多媒体、场景展示、沉浸式互动等，力求科学而有趣地阐释历史发展与文化内涵的关系。这样“史”与“物”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博物馆的教育作用。

宋元至明清时期，这一部分展览面积2300平方米，也是整个展览的最后一部分，为了达到最好的观感，这一部分有760多件（套）藏品进行展出。在考虑到以“藏品叙事”为主的同时，黄河展也考虑到观众对于这些文物的解读，观众想要了解什么，想了解到什么程度，一个好的展览不仅要传递历史，同时也要解惑。例如鄂尔多斯地区是怎么从多元政权并立逐渐走向统一一体，成为中华民族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美的鄂尔多斯头戴是否沿用至今？诸如此类的疑问，怎么通过“藏品叙事”来告知观众。在观众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展出藏品下都有明确的文字说明，同时微缩景观、多媒体、数字与实体相结合的展示手段使得这个展览给人的观感更加生动。

“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通过三维空间内的立体呈现，力争将博物馆社会教育“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特点和作用发挥到极致，通过这些藏品背后蕴含的历史故事，将鄂尔多斯地域历史文化放在中华文化的大视角中去审视、去解读，从而厘清“本”与“源”、“源”与“流”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全方位呈现出交流互动、交融共生的历史格局。

深品精品

数智赋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促进文旅融合

秦新华

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一般通过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开放交流，并在鼓励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为文化传播和知识共享提供多样性的方式和体验。截至2023年，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达到6833家，这些博物馆既是社会教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线路中的关键体验站。博物馆以其自身浓厚的文化底色，成为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主体之一。

近年来，各地都出现“博物馆热”的现象。2024年“五一”假期，博物馆等文博场所再次成为公众出游的热门打卡地。据国家文物局最新统计，2024年“五一”假期，全国6000多家博物馆共接待观众5054万人次。其中，陕西、浙江、江苏等9个省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以山西为例，据山西·文旅云发布的《山西省2024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全省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今年以来假期最高水平，假日文旅市场延续火爆态势，全面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繁荣，文旅市场消费火热。

山西省内各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山西博物院、太原市博物馆、晋祠博物馆等文博场馆成了省内外游客的首选地。以山西博物院（含山西青铜博物馆）为例，截至2024年6月，上半年参观人数已达到140.6万人次，接近2023年全年参观人数的60%。据山西博物院票务预约系统不完全统计，与2023年上半年相比，2024年上半年18岁以下观众预约参观约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9.8%，增长约1.4倍；18-24岁预约参观约20.1万人次，同比增长21.5%，增长约1.2倍；境外人员预约参观共计1.4万人次，同比增长524.4%，增长速度达到6.4倍。暑假来临，参照以往数据，来博物馆参观文物、感受文化力量的观众会更多。数据表明博物馆作为极具人文属性的文化场所已日益成为旅游路线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对国际友人吸引力逐渐增强，文旅融合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提升空间。

数智化赋能新时代博物馆发展势在必行

在当今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塑造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博物馆行业亦不例外。数智化赋能新时代博物馆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对切实提高博物馆服务效能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数智化可以极大丰富展览形式和内容。通过新媒体信息技术，为观众营造身临其境的参观体验，让古老的文物和历史场景“活”起来。其次，数智化有助于藏品的数字化管理和保护。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藏品的信息进行高效收集、整理和分析，更好地监测藏品状态，提升科学有效保护水平。再次，数智化能够拓展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借助在线课程、数字讲座等方式，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让更多公众高效获取文物知识。最后，数智化还能提升博物馆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通过智能票务、导览系统等，为观众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服务。

总之，数智化是新时代博物馆实现创新发展、提升影响力、更好履行社会使命的必然选择，不仅能够帮助博物馆在文旅市场中脱颖而出，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文化服务产品，还能够提升服务转化效果和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在未来的发展中，博物馆要积极拥抱数智化变革，为公众带来更加丰富、优质的文化体验。

数智化赋能新时代博物馆发展新路径

如何恰当利用数智化技术，切实实现博物馆文旅服务的再升级，是文博领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索数智化赋能新时代博物馆发展的新路径，成为推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其一，加强对博物馆数据资源的数字化整合利用。利用OCR识别、文化元素提取、知识图谱构建等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挖掘文化数据价值，标注、解构和重构藏品蕴含的中华元素和标识，切实融入内容生产、创意设计和城乡建设，从而进一步推进博物馆在文旅融合、文化消费中的关键作用。

其二，打造沉浸式的数字展览空间。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等前沿技术，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参与历史事件，与文物进行深度互动。例如，通过AR技术，观众可以在手机屏幕上看到虚拟的古代人物在展品旁讲述其背后的故事，极大地丰富了观展体验。

其三，开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教育活动。线上方面，开发丰富多样的数字教育资源，如在线课程、短视频、互动游戏等，满足不同年龄段和学习背景观众的需求。线下则结合数字化设备，如智能导览、互动展示屏等，增强现场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

其四，运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广泛传播。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展览信息、藏品故事、学术研究成果等内容，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同时，利用博物馆自身的传播阵地，提供在线展览、藏品查询、预约服务等功能，拓展博物馆的服务边界。

其五，丰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根据博物馆业务开展情况和自身特色，将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多场景应用，打造智能导览、智能研学、智能游记等立体化的智慧服务，以此创新观众参观体验，提升博物馆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吸引力。

其六，提升服务质量管理的评估保障和反馈机制。数智化技术能够为博物馆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监测和评估体系。通过信息技术自主收集和分析观众的反馈数据，博物馆可以及时发现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提高文旅服务效率和质量。

博物馆数智化赋能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数智化技术是实现文旅融合的关键媒介，数智化浪潮正以磅礴之力为新时代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赋予强大动力。

一是博物馆线上服务及宣传推广形成文旅吸引力。当前，多数博物馆已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型社交媒体平台和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等数字渠道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文化，逐步形成了博物馆文旅宣传的重要阵地。通过线上服务，丰富的馆藏资源得以跨越时空限制，向更广泛的受众展示，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范围。同时，博物馆的特色线下服务内容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得到宣传推广，让国内外观众提前了解感知，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博物馆的吸引力。

二是博物馆数智化服务保障文旅融合过程中的服务效果。博物馆场馆的智慧化服务可提高博物馆观众接待能力，例如App导览、微信导览、AR导览、语音导览等导览服务系统，能够为公众提供多重选择，实现多途径的针对性服务。同时结合虚拟现实等技术形成的研学导览可为观众打造个性化且沉浸式的体验，使游客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文物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博物馆能够把握游客需求，优化服务流程，精准推送文物信息，开发定制化的文旅产品，从而进一步提升博物馆智能化服务水平，为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注入强大动力。

三是文创产品催化博物馆在文旅融合中的深层次作用。数字文化创意、数字文创产品的建设作为文化属性与旅游纪念的有机结合是博物馆智能化服务的重要体现。博物馆数智化促进了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打破了文化、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之间的边界，实现了跨界融合。例如，“文旅+科技”催生出数字藏品等新兴业态；“文旅+教育”打造出研学旅行等教育型文旅产品。这种融合发展不仅丰富了文旅产业的内涵，也为文旅事业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推动文旅事业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四是博物馆丰富的馆藏为文旅资源的深度融合提供基础保障。博物馆藏品是文旅资源融合的重要基石，为文旅事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博物馆为文旅市场提供优质文化服务产品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并以创新新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通过对馆藏的研究、展示和解读，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为旅游产品增添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使得文旅融合更具独特性和吸引力。数智化进一步推动了文旅资源的深度整合与高效管理，对各类文旅资源进行全面梳理和精准分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为新时代文旅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文旅高质量融合是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旅游因文化更富魅力和趣味性，文化因旅游更具有活力、传播力、更加彰显影响力。博物馆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承场所，拥有丰富的文物、艺术品和历史资料，为文化旅游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同时，文化旅游的发展也为博物馆带来了更多的观众流量，促进了博物馆的推广和传播，提升社会影响力。博物馆不断创新和优化服务，又能更好地满足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吸引更多游客参与，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